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

陆伟芳

内容提要 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从 19世纪 60年代开始,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已经进行了半个多世纪。妇女争取选举权的方式也从温和的宪政方式发展到激烈的“战斗”方式。政府却对妇女的政治诉求充耳不闻, 运动陷于僵局。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斗争双方从全新的视角看待妇女选举权问题提供了契机。妇女们很快从和平反战转到支持和参与战争的立场上来, 她们开始从舆论宣传到实际参与, 从工厂到志愿工作, 从办公室到战地服务, 全面参与。她们的全面积极的参与战争, 使英国男性不得不承认女性所起的重要作用, 从而消除了阻碍妇女选举权的三大障碍, 使英国部分女性在 1918年获得了选举权。

关键词 英国妇女 选举权 志愿工作 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国内外学术界, 尽管已经开始关注“战争中的妇女”或“妇女与战争”这样一个被长期忽略的问题, 如著名的女性主义学者琼·贝思克·爱尔希坦 (Jean Bethke Elstain) 的《女性与战争》一书就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 展现了妇女以及不同的女性主义学者关于战争的认知及态度的多样性。¹ 尽管“战争因它的参与者的性别而显出不同的性别色彩”。² 但不可否认的是, 现有的战争史仍然是男性主导的战争史, 女性与战争的关系仍是一个缺乏研究的课题, 因此, 对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关系进行个案研究, 无疑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¹ 琼·贝思克·爱尔希坦:《女性与战争》(Jean Bethke Elstain, *Women and War*),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95年版。

² 李小江主编:《让女人自己说话:亲历战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年版, 第 6页。

» 在国内外, 有关妇女与战争的研究相对薄弱, 在国外的两份主要从事妇女研究的学术期刊《妇女研究国际论坛》(*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和《妇女史评论》(*Women's History Review*) 上只发表过零星的相关研究。在《妇女研究国际论坛》上有: H. 帕特里夏·海因斯:《女性身上的战场: 战争对妇女伤害的考察》(H. Patricia Hynes “On the Battlefield of Women’s Bodies An Overview of the Harm of War to Women”) 第 27卷, 2004年第 5—6期; 《战争以外: 前提与预言》(“Beyond War Preconditions and Prophecy”) 第 30卷, 2007年第 4期; 琼·蒙哥马利·拜尔斯:《女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经历: 参政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诗人》(Joan Montgomery Byles “Women’s Experience of World War One Suffragists, Pacifists and Poets”) 第 8卷, 1985年第 5期。在国内也有一些文章涉及这个课题, 如熊伟民:《20世纪 80年代初期英国妇女的反核和平运动》《长沙大学学报》2004年第 3期; 梁文敏:《妇女与战争——对西方女性主义战争观的理解与反思》,《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 12期; 常精彩:《战争对古罗马妇女家庭生活的影响》,《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2009年第 2期; 李少春:《战争与受战争侵害的妇女》,《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3年第 3期等。至于战争与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的关系, 英国普利茅斯大学的安吉拉·K. 斯密斯 (Angela K. Smith) 女士有不少独到的研究。她的专著: 安吉拉·K. 斯密斯:《第二战场: 妇女、现代主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The Second Battlefield: Women, Modernism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曼彻斯特大学 2000年版) 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选举权话语》(Suffrage Discourse in Britain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埃希盖特出版社 2005年版) 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与英国妇女运动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 专门的文章也是她发表于《妇女史评论》(第 12卷, 2003年第 1期) 上的《潘克赫斯特一家与战争: 参政杂志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舆论宣传》(“The Pankhursts and the War Suffrage Magazines and First World War Propaganda”), 研究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妇女参政杂志的政治宣传问题。

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从 19世纪 60年代开始,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已经进行了半个多世纪。最早的妇女组织“妇女选举权全国同盟”(NUWSS)以温和的符合宪政的斗争方式, 特别是“太太的客厅式”的宣传, 向议会递交请愿书, 致力于在议会里寻找妇女选举权事业的支持者和同情者, 使妇女选举权的提案多次被摆到议会长桌上。然而, 雪片似的请愿书和频繁的集会只是体制外的呼吁, 根本感动不了充满男性偏见的政客们。¹ 于是, 20世纪初, 另一个激进的妇女组织“妇女社会政治同盟”(WSPU)登上历史舞台, 试图用激烈的“战斗”方式唤起政治家和民众的注意, 从而争取妇女选举权。² 但是, 英国政坛仍然对妇女的选举权要求视而不见, 充耳不闻, 妇女运动似乎陷入了僵局。就在这时,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在爱国主义还是妇女选举权、战争还是和平的选择面前, 英国妇女被现实政治逼到了十字路口: 选择国家还是选择妇女的事业? 选择民族战争还是选择妇女国际团结? 国家的命运与妇女的命运有着怎样的关系? 如何在战争环境中促进妇女选举权的事业?³ 这就是当时英国女性普遍思考的问题, 也是本文探讨的主要问题。

—

妇女选举权运动开展的半个多世纪中, 妇女运动的理论与实践大多停留在现实政治的阵线以外, 与现实政治没有太密切的关联。但是, 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却使妇女选举权运动不得不面对现实政治的挑战与洗礼。“战争已经开始, 我们还没有赢得选票。”⁴ 这场战争对妇女选举权运动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 使致力于理论宣传的妇女选举权运动骤然陷于慌乱之中。“从1914年起, 妇女选举权运动的旧同盟被瓦解, 对战争的回应成了关键问题。”⁵ 现在, 用什么方式获得选举权、怎样获得选举权似乎退居二线, 让位于迫在眉睫的战争问题。

妇女选举权运动的主要组织大多经历了戏剧性的转变, 从理想主义的和平反战到现实主义的支持战争的转变。在战争爆发前夕或爆发之际, 妇女选举权运动的组织或领袖人物大多沉浸于理想主义色彩的“性别阶级”思想, 发表谴责战争、呼吁和平的宣言, 团结一致反对战争, 并把和平与女性、“好战”与男性联系起来, 从而形成了短暂的反战和平的妇女团结。在国际妇女界, 在战争阴云密布之际, “国际妇女选举权同盟”(International Woman Suffrage Alliance IWSA)及其英国分会“妇女选举权全国同盟”, 就向英国外交部和驻伦敦的外国大使们递交了《国际妇女宣言》, 道出了欧洲大陆

¹ 从 1867 年到 1913 年, 总共有 26 份涉及妇女选举权的提案或决议案或修正案提交给议会讨论, 其中 4 份被搁置, 2 份被其他事务挤占了讨论时间, 只有 8 份进入了二读程序。

² 战斗的方式包括从请愿、签名、集会, 到会上质询干扰政治家集会、组织游行示威, 乃至砸窗户、纵火、制造爆炸事件等, 被囚后则展开绝食行动, 最后迫使政府在《猫鼠法》下与绝食女囚展开猫捉老鼠的游戏; 为了引起社会舆论与政界的关注, 甚至有成员在赛马场的御马蹄下献出生命。

³ 对此, 马丁·皮尤在《英国妇女与妇女运动, 1914—1999》(Martin Pugh *Women and the Women's Movement in Britain, 1914–1999*, 麦克米伦出版公司 2000 年版)中认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妇女选举权运动实际上消失了。而桑德拉·斯坦利·霍尔顿则相反, 她在《女权主义与民主: 1900—1918 年的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与改革政治》(Sandra Stanley Holton, *Feminism and Democracy: Women's Suffrage and Reform Politics in Britain 1900–1918*, 剑桥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第 151 页)中认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妇女选举权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受到触及和影响。最近, 安吉拉·K. 斯密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选举权话语》中认为, 女性在战时的角色是多样化的, 与战争和妇女选举权运动的关系也是多样化的。

⁴ 索菲亚·A. 范温格登:《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 1866—1928》(Sophia A. van Wingerden *The Women's Suffrage Movement in Britain, 1866–1928*), 麦克米伦出版公司 1999 年版, 第 154 页。

⁵ 希拉·罗博特姆:《妇女的一个世纪》(Sheila Rowbotham, *A Century of Women*), 企鹅出版集团 1997 年版, 第 67 页。

与英国女性对战争前景的“忧虑和沮丧”，呼吁和平：“我们来自 26 个国家的妇女，团结在国际妇女选举权同盟里，旨在获得与男性分享政治权力的手段，这种政治权力塑造了民族的命运，我们请求你们尝试任何方法来和解或调停国际差异，这也许有助于避免让半个文明世界陷于战争的腥风血雨之中。”¹ 另一方面，英国国内的各个妇女选举权组织也从各个角度反对战争，不仅是主要代表伦敦东区贫苦女工利益的妇女组织（ELFS）谴责战争，其领袖潘克赫斯特夫人（Emmeline Pankhurst 1858—1928）的小女儿西尔维亚·潘克赫斯特（Sylvia Pankhurst）认为那是资本家的战争。² 而且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两个主要妇女选举权组织——“妇女社会政治同盟”和“妇女选举权全国同盟”也异口同声地谴责战争。一贯充满战斗热情的“妇女社会政治同盟”的领袖之一、流亡法国的克里斯特贝尔·潘克赫斯特（Christabel Pankhurst）在巴黎总部发表声明，以反对发动战争的男性，“这场大战……是自然的报复——是上帝对让女性处于从属地位、从而摧毁了完美的人类平衡的人的报复”³。1914年8月4日晚8点，大多数妇女选举权组织在伦敦金斯威厅举行了妇女和平大会。会议由妇女劳工同盟和妇女合作基尔特组织、全国同盟领袖福西特夫人（Millicent Garrett Fawcett 1847—1929）主持。会议旨在支持英国中立，认为战争是一场灾难，敦促中立国调解结束战争。⁴ 激进的和平主义者玛丽·希普尚克斯（Mary Sheepshanks）则宣告，女性不要简单地包扎“男性制造的伤口”，而是“运用她们的头脑明白欧洲战争狂热的起因”⁵。

但是，随着战火的逼近，随着战争成为英国的政治现实，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一以贯之的单一目标策略——专心致志于为女性争取选举权，而不与当时英国社会的其他政治运动相牵连——受到了挑战。世界大战势必要打破妇女运动的这种策略，迫使妇女面对现实的政治，而不能再置身事外。而且在和平等于对国家的不忠的思想斗争下，经过最初的理想主义的抗议后，妇女选举权组织迅速实现了支持战争的戏剧性转变。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妇女选举权运动中的大多数人与其他英国人一样，很快卷入到爱国主义和英雄情怀中去。在某种意义上，世界大战的爆发对妇女运动的走向是决定性的：几乎在几天之内，“性别战争”就被世界大战的喧嚣所淹没。对陷在爱尔兰内战中、对用《猫鼠法》⁶ 镇压战斗的妇女参政者的英国政府来说，战争简直成了“救星”。宣战后第三天，英国政府就宣布对那些因战斗的参政运动而入狱的人实行大赦。⁷ “分歧与冲突被遗忘，整个国家团结一心，在危难时刻保卫祖国……每个人都自问：在这个危机中我能为国家做些什么？”⁸ 妇女选举权组织在开头呼吁和平后，几乎大多数都投身到战争工作中去了。

为争取妇女选举权而与政府激烈冲突的“妇女社会政治同盟”也迅速完成了从政府挑战者到支

¹ 索菲亚·A. 范温格登：《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1866—1928》，第 155 页。

² 希拉·罗博特姆：《妇女的一个世纪》，第 67 页。

³ 索菲亚·A. 范温格登：《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1866—1928》，第 155 页。

⁴ 哈罗德·L. 史密斯：《英国妇女选举权战役，1866—1928》（Harold L. Smith *The British Women's Suffrage Campaign, 1866—1928*），朗曼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5—56 页。

⁵ 希拉·罗博特姆：《妇女的一个世纪》，第 71 页。

⁶ 原名为《囚犯因病暂时释放法》，俗称《猫鼠法》。即当绝食的妇女囚犯身体过弱时，允许妇女暂时回家休养，当身体状况许可时再继续服刑。结果许多妇女利用这个机会溜之大吉，而警察则像猫一样四处搜捕这些妇女，妇女们形容警察与妇女囚犯的关系像猫与老鼠的关系，故称。

⁷ 马丁·皮尤：《英国妇女与妇女运动，1914—1999》，第 7 页。

⁸ 索菲亚·A. 范温格登：《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1866—1928》，第 155 页。

持者的角色转变。“妇女社会政治同盟”从 1903 年成立起就一直是一个战斗的团体,运用激烈的手段争取妇女选举权,采取战斗行动,向政府挑战,要求妇女选举权,因此被称为战斗的妇女参政组织。现在,在国际性战争的大是大非面前,在政府大赦的示好姿态下,它迅速改变其语调和策略,全力支持战争。其领袖潘克赫斯特夫人认为,在民族危难关头,女性反对政府将会一无所获,而站在政府一边则任何事情都有可能。¹ 因此她宣布暂停妇女选举权活动,支持战争。她的长女克里斯特贝尔·潘克赫斯特也从巴黎流亡地回到英国;她们的舆论阵地《战斗妇女》更名为《大不列颠》来出版,以彰显其立场的转变。

另一个重要的妇女选举权组织“妇女选举权全国同盟”的调整要费时费力一些。从 19 世纪 60 年代以来,它一直用和平宪政的合法方式与途径争取妇女选举权。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它在与和平主义简短调情后,就正式与和平主义宣传划清了界线。这种态度的急剧变化有两个原因,一则领袖福西特夫人相信,倡导和平的妇女国际会议可能会在民族阵线上陷于分裂,使妇女显得荒谬可笑。二则她受到妇女选举权的坚定支持者罗伯特塞·塞西尔 (Robert Cecil) 爵士明白无误的警告,如果涉足和平事业的话,将会失去在政坛上支持妇女选举权事业的政要的支持。² 于是福西特夫人随后在《共同事业》(*The Common Cause*) 上宣布,“不管我们的要求被承认与否,让我们展示我们配得上公民权”³。“我们不再讨论英国介入这场战争的是是非非”,“英国已经参战,这是铁板钉丁的事实,我们接受战争作为目前的现状,我们眼下关注的是在这个条件下做一个优秀公民”⁴。《英国女人》(*The Englishwoman*) 的编者宣布“所有英国臣民的首要目标”是打这场正义之战,“尽可能反对贫困、疾病、和每场战争带来的其他罪恶”。另一些领袖人物,如埃莉诺·拉斯伯恩 (Eleanor Rathbone)、鲍尔弗夫人 (Lady Frances Balfour) 也坚持女性得通过爱国的战争工作来证明自己的价值。⁵

当然,妇女选举权组织其内部仍有一定的反战势力,最终导致了组织的分化。在最大的妇女选举权组织全国同盟里,在决定支持战争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其执委会有一半人愤而辞职,包括《共同事业》的编辑莫德·罗伊登 (Maud Royden)、荣誉书记凯瑟琳·考特尼 (Kathleen Courtney)、议会书记凯瑟琳·马歇尔等。后来,她们与其他反战女性一道成立了“妇女国际同盟英国分会”(Women's International League in Britain)。1917 年夏,另一个从事和平活动的“妇女和平十字军”(Women's Peace Crusade) 成立。在战斗的妇女参政组织内也分化出了一部分,主张继续妇女选举权活动,而非热衷于战争事务。1915 年 10 月,罗丝·拉马丁·耶茨 (Rose Lamartine Yates) 主持了“妇女社会政治同盟”不同政见者的会议,反对组织转向支持战争。到 1916 年,这些不同意见者形成了两个组织:“妇女社会政治同盟之战斗妇女”(Suffragettes of the WSPU) 和“独立之妇女社会政治同盟”(Independent WSPU),继续从事妇女选举权活动。⁶ 而西尔维亚·潘克赫斯特则坚持她为伦敦东区贫穷女工的工作,把妇女选举权与改善工人处境结合起来。更有人直接从事反对战争的行动,如“反征兵协会”(No-Conscription Fellowship NCF) 就是帮助年轻人逃避兵役,反对战争的。当然,应该承认,在

¹ 安吉拉·K. 斯密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选举权话语》,第 4 页。

² 马丁·皮尤:《英国妇女与妇女运动,1914—1999》,第 11 页。

³ 哈罗德·L. 史密斯:《英国妇女选举权战役,1866—1928》,第 56 页。

⁴ 索菲亚·A. 范温格登:《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1866—1928》,第 156 页。

⁵ 马丁·皮尤:《英国妇女与妇女运动,1914—1999》,第 7 页。

⁶ 哈罗德·L. 史密斯:《英国妇女选举权战役,1866—1928》,第 60—61 页。

当时的英国，和平反战运动总体上只是很小的一个运动，人数有限。“和平与自由妇女国际同盟”在1916年只有2458个成员，到1918年只有3687人而已。¹

战争爆发前后，英国妇女选举权组织从理想主义的反战言论，到战争爆发后大多数投入战争事业的转变，正说明了妇女选举权事业不能置身于英国现实政治之外，少数人的和平主义言论与行动，在战争的大是大非面前，似乎成为了“众矢之的”。而战争爆发前后妇女选举权组织和个人面临战争表现出来的慌乱，正表明了女性主义面临战争问题的深刻困境。因为从理论角度上来说，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本身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在妇女与战争问题上也是如此。女性是否与战争对立？女性是否应该参与战争？这些问题都没有达成共识。这些分歧反映在现实政治领域，就体现为参政运动的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体现为妇女选举权组织在战争爆发前后表现出来的反战和平运动与积极支持战争的急剧转变。

二

在战争期间，妇女选举权组织不仅大多在思想上与理论上“暂停”妇女选举权运动，停止“性别战争”、停止反战和平运动，全力支持战争，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从多方面支持战争、乃至直接参与战争服务。她们充分运用妇女选举权组织与女性身份展开大规模的宣传工作，劝说女性支持或直接参与支持战争的工作。她们还直接利用现有的妇女选举权组织，组织各种支持或参与战争的团体或机构。她们直接进入各种专业领域，填补男性留下的空白，为战争服务。

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支持，首先表现为思想舆论上的支持，宣传支持战争的合理性，宣扬女性参与战争的正当性。一种是宣称爱国主义与女性是天然的和平主义者的观念并非不相容的；相反，对祖国的忠诚是和平家园的最好保障。换言之，先救祖国，然后才是妇女选举权。另一种是坚信德国侵略者比英国政府更具“男性气质”，因此是妇女运动的最大敌人，民族主义要先于国际主义姐妹情谊。² 福西特夫人认为，帮助战争是证明她们自己是“配得上公民身份”的测试，强调为国服务是公民权的基础，是把女性领域扩展到爱国职责当中去。1915年2月的全国同盟年度理事会议的最后一天，福西特夫人发言，她说直到把德国侵略者赶出法国和比利时的领土前，“我相信谈论和平等于叛国”³。潘克赫斯特夫人在战争爆发两天后就表示：“我们这一组织在过去是为了提高妇女的权利，现在却可以用来帮助我们的国家度过这段紧张而痛苦的时期。”⁴

其次，配合政府的工作，动员女性参加与战争有关的、帮助战争的具体工作。随着大批男子走向战场，英国人力资源的匮乏日益暴露出来，因此急需大量的女工走上工作岗位。于是，固守传统“领域分离”的男性政治家们再也顾不得“传统”，再也不提妇女的“私人领域”，转而向妇女呼吁帮助，呼吁妇女进入工厂等“公共领域”。军需部长劳合·乔治急需女工进入机械工业从事军火生产，以满足战争需要，而潘克赫斯特母女与之密切配合，她们为政府的征兵作宣传演讲，支持政治新星劳合·乔

¹ 马丁·皮尤：《英国妇女与妇女运动，1914—1999》，第10页。

² 索菲亚·A. 范温格登：《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1866—1928》，第157页。

³ 哈罗德·L. 史密斯：《英国妇女选举权战役，1866—1928》，第58—59页。

⁴ 阿瑟·马威克：《洪水泛滥：英国社会和第一次世界大战》(Arthur Marwick *The Deluge: British Society and the First World War*)，企鹅出版集团1965年版，第88页。

治的战时工作。1915年夏天,劳合·乔治鼓励潘克赫斯特夫人组织妇女要求参与机械业工作的大游行活动。他为此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支持,并接见了相关代表团。7月7日,在军乐的伴奏下,大约2万名女性进行了盛大游行,游行队伍从威斯敏斯特一直行进到布莱克佛里埃桥(B lackfriars)。¹于是,女性更多地走出家庭,走上各种各样的工作岗位。她们穿上男子的服装,成为司炉工人、铸造工人、机枪的生产者,甚至还加入军校。²正如诗歌所说:“母亲做家务,没有任何仆人,还要去生产军需品,挣钱补贴家用。护士们总是忙碌着,没有休息时间,为战士们缝补衣物。每一个人都在做着,为战争的事情,女孩们在做着,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汽车售票员、驾驶小汽车或是货车。整个世界都颠倒了,自从战争开始的那一天。”³

1915年上半年,女性劳动力就被大量征集到军工产业以及重工业中。到夏末,由于战争军需品和生活必需品的生产须进一步扩大,妇女劳动力第一次得到大范围大批量的使用,尤其在生产军需品的工厂中,大量工人阶级妇女作为非熟练工人参与军火生产,有效地保证了军火供应。1916年实行的普遍征兵制,使妇女就业人数出现了决定性的大幅度增长,甚至一些上层社会妇女也开始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1914年到1918年期间,在部门就业的女工人数从2 171,900人提高到2 971,100人,增加了约80万⁴。

女性不仅进入了原先属于男性的政府和公司职员、电车司机等行业,还参加了炮弹、弹药桶等的生产,从事着从生产、清洁、后勤服务到汽车驾驶、军需管理的各项工作。她们还在光学仪器制造工业和飞机工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⁵随着英军伤亡人数的上升以及强制性征兵的开始,男性劳动力开始在各类工业、商业以及服务业中被女性所代替。整个战争期间,交通部门女工的人数增长幅度最大,从1914年的118万增加到1918年的1117万。而家庭女佣的人数却呈现出明显的衰落,1914—1918年,从1,651,800减少到了1,251,800⁶。有些人开始放弃以前的低收入工作或没有吸引力的工作,尤其是离开家庭服务或“血汗工厂”的工作,换成工资高、有地位的工作。妇女选择工作的机会明显增多,在政府机构、公用事业、运输业、建筑业中的增长最为迅速。同时,妇女的工作条件也得到了改善,尤其是那些进入办公室工作的妇女,甚至军工厂的女工也对坐着工作很满意,那要比做女仆时整天忙里忙外好得多。⁷从1914年到1918年,女汽车驾驶员从1700人增加到28 900人,专门生产弹药的伍尔维奇兵工厂在1914年仅雇用了125名女工人,而到1917年女工人数上升到了28,000人。妇女还进入到需要强体力的工作场所,从搬运工作到机器制造,从炮弹生产到前线救护,到处都有妇女的身影。这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妇女从事商业性工作的人数从50万上升到了100万,在交通运输业中的人数从18 000上升到115 000在工业中则由200万上升到300万⁸。总的

¹ 马丁·皮尤:《英国妇女与妇女运动,1914—1999》,第9页。

² 戴安娜·苏阿米:《一个女人的位置》(Diana Souhami A Woman's Place),企鹅出版集团1986年版,第35页。

³ 亨利·理查森等著,郭洪涛译:《女人的声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4页。

⁴ 《1919年关于工业中妇女就业的委员会报告书》("Report of Committee on Women in Industry 1919", XXXI Cmd 135),转引自彭沛:《浅谈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妇女地位的改善》,《南京社会科学》1999年第8期。

⁵ 希拉·罗博特姆:《妇女的一个世纪》,第76页。

⁶ 《每日邮报》(1917年2月24日)(Daily Mail 24 February 1917 Cmd 135),转引自彭沛:《浅谈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妇女地位的改善》,《南京社会科学》1999年第8期。

⁷ 陆伟芳:《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7页。

⁸ 戴安娜·苏阿米:《一个女人的位置》,第42页。

来说,妇女的就业人数从战前的 493万上升到 1918年 7月的 619万,增长了 23 7%¹。

最后,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的主要阶级基础中产阶级女性直接参与与战争相关的组织与活动。各个妇女选举权组织不仅在舆论上支持战争,在行动上缓解战争对民众带来的艰难困苦,更是组织人力挨家挨户动员女性参加工作,支持国家的战争,乃至亲身进入职业领域,为国家分忧解难,战争让女性进入了原本只属于男性的行业并得到了认可。1914年 7月,只有 1500名妇女进入银行工作,到 1918年 4月已经达 37,600人,专业人员从 5万上升到了 12万,女公务员由 66,000人上升到 225,000人²。从下面的 1914—1918年英国女性就业增长表中也可以看出,除了从事工业生产的女性增长了 68 4% 外,参与各种白领工作的女性也有了质的飞跃,增长了 50 9%,她们从事各级政府机构、地方公共事业、市政交通运输、各种专门职业、银行金融服务、旅馆戏院及地方政府包括邮局与教师等白领职业,其中增长最快的是在政府机构中工作,增长了 1015%。

1914—1918年英国女性就业增长³

行业	1914年 7月女性就业数	1918年 7月女性就业数增长	增长百分比
工业总计	2,176,000	+ 565,000	68 4%
政府机构	2,000	+ 223,000	10150%
地方公用事业(水电煤)	600	+ 4,000	704 3%
市政交通运输业	18,200	+ 99,000	545 4%
公务员(包含邮局)	66,000	+ 168,000	254 4%
专业人员	50,500	+ 69,000	136 5%
银行、金融和商业	505,500	+ 429,000	84%
旅馆、酒店、戏院	181,000	+ 39,000	21 2%
地方政府(包括教师)	196,200	+ 30,000	15 5%
总计	3,196,000	+ 1,626,000	50 9%

在医疗行业中,妇女的作用尤其重要。大量的中产阶级和上层妇女作为护士上前线照顾和护理伤员,而女医生则几乎供不应求。1914年 12月,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了一封鼓励女性进入医疗行业的群众来信,并附有支持性的编者按。医学院和医院不得不开始接受女医生的培养和训练,从 1914年到 1921年期间,女医生的数量增加了一倍。一位著名的妇女选举权运动积极分子埃尔西·英格利斯(Elsie Inglis)医生就建立了支持战争的医疗队。在苏格兰妇女参政联合会的帮助下,她创建了苏格兰女子医院。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爆发,她在向政府提供服务遭到拒绝后,就组织了妇女医疗和护理队,帮助联合政府。女医生的身影活跃在各种医院,随着男医生加入军队,她们很快填补了留下的空白。1917年,简·特恩布尔(Jane Turnbull)医生被任命为战争部医疗顾问,专门处理军队

¹ 马丁·皮尤:《英国妇女与妇女运动,1914—1999》,第 21 页。

² 戴安娜·苏阿米:《一个女人的位置》,第 42 页。

³ 资料来源:英国贸易部:《1918 年 7 月英国所有职业就业状态报告书》("Report on the State of Employment in All Occupations in the United Kingdom in July 1918")。转引自马丁·皮尤:《英国妇女与妇女运动,1914—1999》第 20 页表格 2.2。

中女医生的相关事务。¹ 虽然女医生仍然只能充当助手, 得听命于任何一个男医生, 但是, 她们毕竟已经跻身于医生这个行业。

不仅如此, 战争刚开始不久, 许多上层和中产阶级的妇女加入各种志愿组织, 直接参与战争服务。这种工作一方面是中上层女性以前从事的慈善工作的继续, 另一方面, 也是为女性打开新的就业渠道。到 1915 年, 各种志愿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如“志愿救助分队”、“紧急救护志愿军”等志愿性组织。女性纷纷成为护士、救护车司机, 以及成为“机械运输组织”中的汽车驾驶员与保养员等,² 直接或间接地支持战争事业。例如, 成立于 1915 年 2 月的“妇女志愿救助队”(Women's Volunteer Reserve WVR) 为急救、运输、空袭、电报等提供人力。女性还直接参与军事服务机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立的三个军事辅助团, 无一例外都是组织女性直接服务于军队。如成立于 1917 年初的“妇女军事辅助团”(Women's Army Auxiliary Corps) 意在为军队提供职员、厨师、家庭服务, 到 1918 年已有 35 000 人报名。1917 年底成立的“妇女皇家海军服务团”(Women's Royal Naval Service) 和 1918 年 4 月成立的“妇女皇家空军服务团”(Women's Royal Air Force) 旨在提供文书、家政、邮政、仓储、电力和机械方面的服务。³

由此可见, 直接间接帮助战争的女性越来越多, 在办公室、医院、商业、行政、教育、银行业及金融业等领域内就业的妇女人数都在快速增加。有统计数字表明: “在 1914 年 7 月, 英国大约有 2370 万女性公民, 当时妇女的就业总数为 590 万人, 其中 217 万人在工业部门工作。到 1918 年 7 月, 就业妇女总数达 830 万人, 比 1914 年净增了 235 万人。”⁴ 女性参与与战争有关的工作, 无论在工厂还是从事志愿工作, 无论是参与急救还是医疗, 对人力相对匮乏的英国来说, 不仅解决了极度紧张的劳动力问题, 而且让女性轻易进入了体面的职业领域, 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观念, 为战后女性获得参政权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三

英国妇女选举权组织从思想上到行动上积极支持和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相关工作, 这对改变妇女的形象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也为妇女争取到了“私人领域”以外的“公共领域”的发言权。这样,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奋斗, 特别是战争的经历, 英国女性终于使男性承认了女性在公共领域的作用, 懂得了女性可以拥有选举权这个道理。1916 年 5 月 7 日, 首相回信福西特夫人: “你可以确定, 如果有这样的举措, 那么你信中提及的问题(妇女选举权问题)会得到不带任何偏见的、全面的考虑。”⁵ 同年夏天, 当选举法案如箭在弦上、蓄势待发时, 各妇女选举权组织活跃起来了。向议会派遣

¹ 海伦·琼斯:《英国公共生活中的女性, 1914—1950 年》(Helen Jones *Women in British Public Life, 1914–1950*), 皮尔森教育集团 2000 年版, 第 38—39 页。

² 希拉·罗博特姆:《妇女的一个世纪》, 第 73—75 页。

³ 马丁·皮尤:《英国妇女与妇女运动, 1914—1999》, 第 30—31 页。

⁴ 罗伯特·R·詹姆斯:《英国革命: 1880—1939 年的英国政治》(Robert Rhodes James *The British Revolution: British Politics 1880–1939*), 企鹅出版集团 1978 年版, 第 360 页。

⁵ 安德鲁·罗森:《站起来, 女人! 1903—1914 年妇女社会政治同盟的战斗活动》(Andrew Rosen *Rise Up, Women! The Militant Campaign of the 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 1903–1914*), 伦敦 1974 年版, 第 257 页。

代表团,约见内阁大臣……¹ 终于,《人民法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末期通过,法案授予年满30周岁的女性户主选举权。由此可见,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英国妇女获得选举权的重要催化剂。

首先,妇女的战时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政府阻碍妇女选举权改革的因素。对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颇有研究的马丁·皮尤认为,女性的影响只是边缘性的:《人民法案》的关键问题是给部队选举权,从而扩大男性选民人数;至于给妇女选举权只是个脚注而已。妇女选举权组织的作用不过是提醒了政客们,女性仍具有鼓动选票的能力而已。而桑德拉·斯坦利·霍尔顿则认为,尽管妇女选举权组织在策略上有分歧,但是由议长会议向议会提出建议的主意来自联合参政主义者,在议长会议上同情妇女选举权的人与妇女选举权组织密切商议过,² 其作用不容抹杀。笔者深以为然。1914年前,妇女获得选举权的最大障碍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首相阿斯奎思的坚决反对;二是“妇女社会政治同盟”的战斗行动;三是各党派对立法形式的争议。在战争中,所有这些障碍都逐渐消除了:“妇女社会政治同盟”在政府宣布大赦后,很快投桃报李,放弃了战斗行动,站到了政府一边,支持战争;联合政府的形成则消除了党派问题;最后,在议长会议期间,阿斯奎思辞去了首相一职,消除了政府里反对妇女选举权的最大障碍。”可见,战争确实给妇女选举权运动提供了独特的助力。

其次,战争期间女性直接或间接地广泛参与到与战争服务相关的工作,使女性就业性质发生了质的变化,使男性多少承认女性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妇女选举权的获得。虽然从总量上来说,女性的就业人数增长不算太惊人,但惊人的是就业领域的扩大,使女性可以放弃以前的低附加值、低收入工作,换成技术含量高、收入高的工作。研究表明,战争期间女性减少的工业部门主要是服装、纺织、印刷和家政业,而在建筑业、金属工业、化学工业、水电煤等公用事业、运输业、专业人员、文官的女性就业增长了百分之几百。³ 妇女所从事的不再是纯粹“传统的妇女工作”(家庭教师、护士、女仆),而是男性工作岗位!特别是女性在军火工厂的工作,直接使女性与战争挂钩。女军医的出现吸引了大量报刊的正面报道,赞扬她们的医疗技能、坚忍不拔和支持战争的继续。⁴ 女性就业领域的质变,使女性不再是隐藏在历史背后的人,而成为有专门技能的群体。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战争无疑是女性扩大就业量、使就业领域发生质变的关键事件,也因而是获得选举权的重要事件。

再次,战时女性工作对英国的传统性别观念构成了第一次强有力的冲击。安杰拉·伍拉科特(Angela Woollacott)认为,英国战时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女性的积极工作加速推进了女性进入专业领域的进程。⁵ 战前,男性政治家及舆论几乎众口一词,强调女性属于私人领域,属于家庭;男性属于公共领域,属于政治舞台,属于工作。而战争的特殊体验,使女性走上原先属于男性的工作岗位,做“男性的”工作,做“体面的”工作,这无疑在事实上冲击着男性的传统思想意识,再要说女性只适合在家庭私人领域就说不过去了。而妇女选举权也终于从少数女性的政治呼吁和少数思想家的理想成为了政治现实,在事实上冲破了在公共领域男性独占鳌头的局面。

¹ 琼·蒙哥马利·拜尔斯:《女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经历:参政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诗人》,《妇女研究国际论坛》第8卷,1985年第5号,第474页。

² 海伦·琼斯:《英国公共生活中的女性,1914—1950年》,第27页。

³ 哈罗德·L·史密斯:《英国妇女选举权战役,1866—1928》,第55页。

⁴ 马丁·皮尤:《英国妇女与妇女运动,1914—1999》,第20页。

⁵ 海伦·琼斯:《英国公共生活中的女性,1914—1950年》,第39页。

⁶ 安杰拉·伍拉科特:《她们生活有赖于她:大战中的军火厂女工》(Angela Woollacott On Her Lives Depend Munitions Workers in the Great War),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页。

最后,当然,战争也促使战时妇女选举权运动出现分化。她们要在和平与战争间做选择,要在爱国主义与国际姐妹情谊间做选择,要在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间做选择,还要在坚持妇女选举权的单一目标还是与现实政治牵连间做选择……这一切说明从妇女选举权运动开展以来,战争构成了对妇女运动的最大挑战。也因此使运动呈现出千姿百态的局面,或坚持和平主义运动,或投身爱国助战行列,或坚持妇女选举权运动,如妇女自由同盟坚持其单一目标——妇女选举权,不与战争有牵连,因此是战争期间唯一的仍然坚持争取妇女选举权的组织。¹或致力于工人女性生活与工作条件的改善,“爱尔兰公民军”(Irish Citizen Army)在社会主义者领袖的带领下,忠实于妇女选举权事业。康诺利(Connolly)在1916年的反对英国统治的复活节起义中起了领导作用,加入“爱尔兰公民军”的马尔凯维奇伯爵夫人(Countess Markievicz)为设置路障强行征收车辆,她戴着最好的紫色羽毛帽子、身穿军服监督急救工作。在起义失败后,她与康诺利一样被判处死刑(后来改为监禁)。爱尔兰的女权主义者在起义后与民族主义者靠得更近了。²这都说明了,在现实政治面前,妇女选举权组织一贯实行不与任何政治组织、政治活动牵连的想法是多么苍白和不堪一击。现实政治要比女性认为的复杂得多。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战争期间妇女组织的各种不同活动方式仅仅是策略上的分歧,而不是对妇女选举权这个目标有什么异议。无论是视和平为第一要义、卷入国内和欧洲大陆的和平运动中去,甚至直接从事反战活动,还是视爱国主义为最高准则,暂时中止了妇女选举权事业,转而支持战争;甚或是高举妇女选举权的旗帜,坚持妇女选举权活动,其实都只不过是妇女在争取选举权策略上的分歧而已。可以说,无论是参战派还是和平派,无论是反战派还是继续妇女选举权活动的派别,她们的目标都是为了促进妇女选举权事业,都是为了妇女获得选举权而争取到合适的筹码。

[本文作者陆伟芳,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扬州 225002]

(责任编辑:任灵兰)

¹ 莉萨·蒂克纳:《女人的奇迹:参政运动偶像,1907—1914》(Lisa Tickner, *The Spectacle of Woman: Imagery of the Suffrage Campaign, 1907–1914*),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05 页。

² 希拉·罗博特姆:《妇女的一个世纪》,第 69—70 页。

nobility lasted over a long period were as follows. Firstly, it related to the special path of the German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The nobility took the “defensive” rule tactics which timed well with the social progress. Secondly, the German nobility had achieved great successes in the modern time. The nobility was economically bourgeoisie and the bourgeoisie politically was imbued with aristocracy, which laid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foundations for the aristocratic rule in the modern German society. Thirdly, cultural factors such as cultural ideas and heritage also contributed to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political privileges of the German nobility.

LuW eifang War and Suffrage——British Women’s Suffrage Movement during World War I

In Britain, Women’s Suffrage Movement lasted for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from the 1860s to the outbreak of World War I. While the government still ignored it, the way of pursuit of the suffrage transformed from moderate constitutionalism to militant radicalism, so the movement reached an impasse. However, World War I provided to both sides a chance to consider the women’s suffrage issue from a brand-new perspective and eliminated the main obstacles of women’s suffrage. Women turned from pacifism to supporting or joining the war efforts; they took part in such activities as propaganda forwar, actual war affairs, factory labor, volunteer work, office activities and battleground service. Their comprehensive involvement in war effort made them a male admittable women’s role in the war, thus main obstacles in the way of women’s suffrage were eliminated and eventually women above 30 got the right to vote in 1918.

Zhang Lanxing An Analysis of Silver Export from Japan by the Europeans during 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the 1540s Europeans (Portuguese) first landed in Japan. There they then spread Christianity and engaged in trade for about a century, which was called “Christian Century” by Japanese and European historians. During this period, huge quantity of silver was exported by the Europeans and silver beca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xport goods of Japan. Therefore, schola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is phenomenon.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exploitation and smelting of Japanese silver firstly, then explains why silver was exported in large quantities, and finally estimates the amount of silver on a basis of usable data. These analysis and calculations show that Japanese silver was not only a sort of important and special commodity but also a sort of significant medium between eastern-western communications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The Japanese silver carried away by the Europeans promoted Eurasian economic intercourses and the early 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world commerce.